

社会联结视角下中小學生偏差行为和受欺凌问题实证研究

金小红, 杨杰, 许松影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重点研究基地, 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 目的 探讨社会联结关系、偏差行为及受欺凌在中小學生群体之间的关联性, 为认识和预防儿童偏差行为和受欺凌问题提供切实的参考依据。**方法** 通过经验分层与非严格随机抽样方法, 对随机抽取的湖北省武汉、潜江、天门市 8 所小学、初中学校 1 044 名學生(留守儿童 612 名, 非留守儿童 427 名, 缺失值 5 名)进行偏差和受欺凌行为的问卷调查。**结果** 偏差行为与受欺凌问题之间呈现正相关($r=0.17, P<0.01$); 留守儿童积极认知的平均水平(2.95)低于非留守儿童(3.07) ($t=-2.31, P<0.05$)。二项逻辑回归分析显示, 受欺凌模型中, 参与日常家务和偏差行为对留守儿童受欺凌问题呈正向影响(β 值分别为 0.55, 0.27, P 值均 <0.05), 同学关系可负向预测留守儿童受欺凌经历($\beta=-0.25, P<0.05$); 偏差行为模型中, 受欺凌对留守儿童偏差行为问题呈现正向影响($\beta=0.58, P<0.01$), 亲子及师生依恋因素可以负向预测留守儿童偏差行为(β 值分别为-0.34, -0.49, P 值均 <0.01)。**结论** 社会联结脆弱、偏差行为及受欺凌在儿童群体中存在明显的关联性, 依恋因素是影响留守儿童偏差行为和受欺凌的共同因素, 参与日常家务对留守儿童受欺凌经历具有独特影响。

【关键词】 偏差; 行为; 暴力; 精神卫生; 學生

【中图分类号】 G 637 G 4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19)06-0870-05

An empirical study on deviant behaviors and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mong children from social bonding perspective/JIN Xiaohong, YANG Jie, XU Songying. School of Soci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of social bonds, deviant behaviors and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mong children, and to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deviant behavior and bullying victimization prevention among children.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1 044 students from 8 schools in Hubei Province through empirical stratification and non-strict random sampling. Among them, 612 were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427 were non-left-behind children. **Results**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deviant behavior and bullying victimization ($r=0.17, P<0.01$); The average level of positive cogni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2.95)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non-left-behind children(3.07) ($t=-2.31, P<0.05$);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participation in daily housework and deviant behavior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bullying victimiz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β for deviant behavior was 0.55, $P<0.01$; β for participation in daily housework was 0.27, $P<0.05$). Relation with peers could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β for peer relationship was -0.25, $P<0.05$). In the deviant behavior mode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deviant behavior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β for bullying was 0.58, $P<0.01$);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teacher-student attachment could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 deviant behavior of left-behind children (β for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was -0.34, $P<0.01$; β for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was -0.49, $P<0.01$). **Conclusion** The vulnerability of social bonds, deviant behavior and bullying victimization shows intercorrelation among children. Attachment is the common factor that affects deviant behavior and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Participation in daily housework has a unique impact on the bullying experience of left-behind children.

【Key words】 Uncertainty; Behavior; Violence; Mental health; Students

改革开放以来, 人口流动限制被打破, 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经济发达的城镇地区, 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成为变迁的参与者与承受者^[1]。研究发现, 相比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更容易产生相关心理和行为问题^[2-5]。但有研究认为此种差异并不明显^[6-7]。

国内外的实证研究已证实越轨者与受害者具有

相似的特征^[8]。青少年越轨的生活方式可以显著预测受害发生^[9-10], 受欺负也可以显著预测儿童攻击、反抗、偷窃等越轨行为^[11]。Jennings 等^[12]研究发现, 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和施害者之间有相当程度的重叠; 即可以解释个人越轨的因素也可以用来解释个人受害行为^[13]。社会控制理论认为, 人之所以没有越轨是因为社会纽带的约束作用, 一旦约束被打破或减弱, 很容易发生违法或越轨行为^[14]。赫希的社会控制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越轨与被害^[15], 依恋因素中, 欺凌者与父母和学校联结程度低, 被欺负的學生在学校和老师的依恋程度上低于没有参与的學生^[16]。但有研究

【基金项目】 20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BSH028)。

【作者简介】 金小红(1978-), 女, 湖北荆州人, 博士,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青少年失范问题。

【通讯作者】 杨杰, E-mail: yanglj314e@163.com

DOI: 10.16835/j.cnki.1000-9817.2019.06.022

发现,与母亲的依恋水平越低受害可能性越大,对父亲和老师的依恋与受害群体无相关^[17];同伴接纳和社会支持可以起到有效的缓冲作用,防止欺凌受害^[18-19]。另外,学业表现越好,经常遭受校园欺凌的可能性就越低^[20-21];校际体育活动的参与可以减少暴力欺负的受害行为,参加与课堂相关的课外活动、社团活动与校园受欺凌增加有关^[22]。本文试图从社会控制理论视角出发,在与非留守儿童的比较中,将社会联结关系、偏差行为及受欺凌等因素整合起来,检验在留守儿童群体中的关联性。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5 年 7—8 月,采取经验分层与非严格随机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在湖北省内抽取武汉市、潜江市与天门市 3 座城市,随后在 3 座城市中经验性选取江夏区、新洲区、后湖镇和张港镇 4 个区域,每个区域各随机选取 1 所小学和 1 所中学,最后选择小学的五、六年级和中学初一、二年级,共 16 个班级为抽样框进行整群抽样(考虑到小学一到四年级的学生难以独立完成问卷,初三学生忙于学业,因此没有将其列入此次调查范围)。所有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共发放问卷 1 100 份,有效回收 1 044 份,有效回收率为 94.9%,其中留守儿童 612 名,非留守儿童 427 名,缺

失值 5 名;男生 540 名,女生 503 名,缺失值 1 名。在调查之前,调查组向被访对象解释调查的原因及结果的应用问题。

1.2 方法 《湖北省农村儿童发展调查问卷》是参照 Bibinar 等^[23-24]比较成熟的研究经验和一些结构化工具整合而成。问卷中偏差行为主要测量了“迟到、旷课”“说脏话、打架”“长时间玩手机、计算机”等 6 项,因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未达到 0.6 以上,根据因子分析情况,选择“说脏话、打架”作为本次测量儿童偏差行为的指标,调查研究对象在过去 6 个月内是否有过说脏话或打架的行为。受欺凌通过“在学校有被他人欺负吗”这一问题测量,主要指过去 6 个月内是否遭受过受欺凌行为,本研究分别建立了以受欺凌和偏差行为为因变量的二项逻辑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参照赫希社会控制理论及相关研究的实际情况,将依附、奉献、参与、信念等相关变量操作化为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课外学习时间、做家务、参加团体活动以及积极认知。为检验自变量和因变量的之间的关系,纳入了常见的性别、学段等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相关变量的问题设置及赋值情况见表 1。问卷信度采用评分者信度分析方法检验,得到肯德尔和谐系数 $W=0.62$,说明评分者评定的等级一致性较高,问卷信度水平较高。

表 1 变量设置及赋值

变量	问题设置	赋值
因变量	受欺凌	0=无, 1=有
	偏差行为	0=无, 1=有
自变量	亲子关系	1=比较差, 2=一般, 3=比较好, 4=非常好
	同学关系	1=比较差, 2=一般, 3=比较好, 4=非常好
	师生关系	1=没有, 2=很少, 3=大部分, 4=全部
	课外学习时间	1=<0.5 h, 2=0.5 h~<1 h, 3=1~<2 h, 4= $\geq$ 2 h
	日常家务	1=从不, 2=偶尔, 3=经常, 4=总是
	参加团体活动	1=从不参加, 2=偶尔参加, 3=经常参加, 4=主动参加并积极活动
	积极认知	1=完全不符合, 2=比较不符合, 3=比较符合, 4=完全符合
控制变量	性别	0=女, 1=男
	学段	0=小学, 1=中学
	是否留守	0=非留守儿童, 1=留守儿童

1.3 统计分析 运用 SPSS 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偏差行为、受欺凌以及社会联结等因素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异;采用相关分析以及 Logistic 回归分析检验样本儿童偏差行为、受欺凌问题和社会联结因素之间的关系,检验水准 $\alpha=0.05$ 。

2 结果

2.1 描述统计分析 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的偏差行为得分(0.45 ± 0.50)略高于与非留守儿童(0.42 ± 0.50),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94, P>0.05$),而且双方在受欺凌经历上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t=-1.70, P>0.05$);社会联结各要素中,留守儿童在亲子关系(3.21 ± 0.96)、同学关系(3.26 ± 0.81)、师生关系(2.57 ± 0.77)以及从事日常家务频度(2.75 ± 0.76)和参加组织活动(2.69 ± 0.84)等变量上的平均水平均低于非留守儿童($3.28\pm0.93, 3.33\pm0.86, 2.64\pm0.79, 2.79\pm0.74, 2.73\pm0.87$),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值均 >0.05);仅在积极认知方面,留守儿童的平均水平(2.95 ± 0.84)低于非留守儿童(3.07 ± 0.77)($t=-2.31, P<0.05$)。

2.2 各变量相关分析 由表 2 可见,受欺凌与偏差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与同学关系、师生关系和参加活动变量呈负相关;其他社会联结变量亲子关系、课外学习、日常家务和积极认知与受欺凌之间相关性无统

计学意义;另外,偏差行为与亲子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课外学习、日常家务、参加活动、积极认知均存在负相关;人口学变量性别、年级与偏差行为的相关有统计学意义。

表 2 中小學生各变量相关系数(r 值,n=1 044)

变量	受欺凌	偏差行为	亲子关系	同学关系	师生关系	课外学习	日常家务	参加活动	积极认知	性别	年级
偏差行为	0.17**										
亲子关系	-0.04	-0.18**									
同学关系	-0.11**	-0.15**	0.22**								
师生关系	-0.13**	-0.22**	0.27**	0.26**							
课外学习	-0.02	-0.10**	0.08*	0.09**	0.16**						
日常家务	0.05	-0.06*	0.10**	0.06	0.08**	0.14**					
参加活动	-0.08**	-0.10**	0.18**	0.21**	0.27**	0.10**	0.17**				
积极认知	-0.04	-0.15**	0.18**	0.18**	0.21**	0.15**	0.14**	0.15**			
性别	0.06	0.23**	-0.02	0.03	-0.01	-0.03	-0.08*	-0.06	-0.03		
年级	0.00	0.13**	-0.21**	-0.08*	-0.20**	0.05	-0.03	-0.14**	-0.03	0.00	
是否留守	-0.00	0.03	-0.04	-0.04	-0.04	0.03	-0.03	-0.03	-0.07*	-0.01	0.09**

注: * P<0.05, ** P<0.01。

2.3 社会联结因素与受欺凌、偏差行为的关系

2.3.1 受欺凌模型 以受欺凌为因变量,偏差行为和社会控制变量为自变量,建立二项逻辑回归模型,总样本模型中偏差行为、同学关系、师生关系和参加日常家务对儿童受欺凌经历存在显著影响(P 值均<0.05)。

留守儿童模型中,偏差行为、同学关系和参与日常家务变量对受欺凌经历具有显著作用,具体而言,偏差行为和参加日常家务活动频率对留守儿童受欺凌产生有正向影响,同学关系对留守儿童受欺凌呈负向影响(P 值均<0.05)。

非留守儿童中仅偏差行为和师生关系能够预测受欺凌发生,偏差行为与受欺凌发生呈正相关,师生关系与受欺凌发生呈负相关(P 值均<0.05)。见表 3。

表 3 中小學生受欺凌二项逻辑 Logistic 回归分析

截距与 自变量	留守儿童(n=610)		非留守儿童(n=419)		总样本(n=1 033)	
	β 值	OR 值	β 值	OR 值	β 值	OR 值
截距	0.73	2.08	1.52	4.56	0.93	2.55
偏差行为	0.55**	1.74	0.66**	1.94	0.59**	1.81
亲子关系	0.01	1.01	0.05	1.05	0.04	1.04
同学关系	-0.25*	0.78	-0.12	0.89	-0.19*	0.83
师生关系	-0.10	0.91	-0.45**	0.64	-0.24*	0.79
课外学习	0.00	1.01	0.05	1.05	0.04	1.04
日常家务	0.27*	1.31	0.11	1.11	0.21*	1.23
参加活动	-0.12	0.88	-0.11	0.90	-0.12	0.89
积极认知	0.00	1.00	-0.01	0.99	0.00	1.00
性别	0.19	1.21	0.03	1.03	0.12	1.13
年级	-0.23	0.80	-0.18	0.84	-0.19	0.83

注: * P<0.05, ** P<0.01。数据存在缺失值。

2.3.2 偏差行为模型 以偏差行为为因变量的二项逻辑回归模型,总样本和留守儿童、非留守儿童模型的伪决定系数(Nagelkerke R²)分别是 0.20,0.25 与 0.15。可见无论是总样本还是留守和非留守儿童样本,受欺凌行为对偏差行为均呈正向影响。总样本模

型中亲子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以及积极认知对儿童偏差行为发生具有反向影响;留守儿童模型中,社会联结因素中仅亲子及师生依恋因素可以预测偏差行为;非留守儿童模型中社会联结因素均不能预测儿童的偏差行为。见表 4。

表 4 中小學生偏差行为的二项逻辑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截距 与自变量	留守儿童(n=612)		非留守儿童(n=427)		总样本(n=1 043)	
	β 值	OR 值	β 值	OR 值	β 值	OR 值
截距	2.48**	11.93	1.35	3.87	2.01**	7.43
受欺凌	0.58**	1.78	0.66**	1.94	0.61**	1.83
亲子关系	-0.34**	0.71	-0.04	0.96	-0.22**	0.80
同学关系	-0.16	0.85	-0.22	0.80	-0.18*	0.83
师生关系	-0.49**	0.61	-0.28	0.76	-0.40**	0.67
课外学习	-0.18	0.83	-0.09	0.92	-0.13	0.88
日常家务	-0.07	0.94	-0.01	0.99	-0.05	0.95
参加活动	0.04	1.04	-0.01	0.99	0.03	1.03
积极认知	-0.18	0.84	-0.24	0.79	-0.21*	0.81
性别	1.16**	3.20	0.83**	2.29	0.98**	2.66
年级	0.55**	1.73	0.16	1.18	0.38**	1.47

注: * P<0.05, ** P<0.01。数据存在缺失值。

3 讨论

与流动人口发展报告结果不同^[4],留守儿童受欺凌行为并没有高于非留守儿童,而且两者在偏差行为上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以往研究显示,在控制一些变量后,留守儿童的偏差行为与非留守儿童无显著区别^[7]。

留守儿童的积极认知程度低于非留守儿童,相关研究显示,相比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一部分是由父亲或母亲单方照顾(37.2%),其中母亲单亲(27.2%)对留守儿童的生活照顾优于其他监护方式,但相比于正常的家庭结构,单亲家庭仍会影响到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25];除此之外,隔代监护是留守家庭中最常见也是最普遍的一种形式,样本中 55.7%的留守儿童是由其祖辈隔代照顾,隔代监护人的文化素质水平较

低,精力有限,无法胜任相应的监护职责,对儿童教育质量较差^[26-27],会影响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留守儿童内部存在分化,不同因素对其影响不同,亲子关系、同学关系及师生关系这三种依恋因素对留守儿童偏差行为和受欺凌问题有着不同的影响,参与因素中参与日常家务对留守儿童受欺凌经历的具有独特影响。调查结果发现,留守儿童群体内部存在明显的差异,只有一部分典型的群体因特殊原因会产生偏差行为及受欺凌。2 个回归模型中,4 个社会联结因素中依恋因素对留守儿童偏差行为和受欺凌影响存在差别,但双方又存在差别,3 种依恋关系中,留守儿童受欺凌经历仅与同学关系较为敏感,而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会影响留守儿童偏差行为的发生,与赫希社会控制理论中有关“重要他人”的依附可减少受害和犯罪行为发生的观点相呼应。留守儿童群体最本质的特征是亲子分离^[28],即使隔代或亲戚抚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因亲子分离而造成的情感缺失,但父母角色的长期缺位,关心不足、沟通匮乏和教育缺失等问题造成留守儿童与父母之间情感联结纽带的断裂,是影响儿童身心健康、行为问题的重要因素。另一些研究指出,师生关系对留守儿童的偏差行为有显著影响^[29],师生依恋会对青少年越轨行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30];同学关系对留守儿童受欺凌有负向影响,留守儿童受欺凌概率随着同学之间亲密关系程度的增高而减低^[31]。儿童进入学校生活后,同伴成为学生时代的重要他人,友好、安全和互助关系中的青少年可以很容易掌握必要的社交技巧,减少个体成为受欺负者的可能性。

参与因素(做家务)对留守儿童的受欺凌呈现独特的正向影响,参与家务活动越频繁,留守儿童受欺凌的可能性就越大。参与课外活动为学生提供了发展社会技能和建立支持和积极关系的机会,有助于建立相互支持的关系,增强依恋关系的保护力量;本研究参与变量呈现的不同作用方向可能与参与的活动类型有关,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儿童参与家务活动可能无法为建立积极和睦的同学关系提供更多机会。另外,社会联结因素中的投入和信念因素未对留守儿童偏差行为和受欺凌产生显著影响,具体原因还有待深入研究。

本次研究存在诸多的不足:首先本研究只进行了横断面研究,缺乏纵向留守儿童问题的动态研究,本文主要探讨偏差行为与受欺凌之间的相关关系,缺乏因果推论;其次,变量的测量有效性有待加强;最后,本次研究只分析了留守儿童受欺凌行为的影响因素,对于其内部发生机制的探讨略显不足。

4 参考文献

- [1] 谭深.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2011(1):138-150.
- [2] 李晓巍,刘艳.父教缺失下农村留守儿童的亲子依恋、师生关系与主观幸福感[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3,21(3):493-496.
- [3] ZHOU M, MURPHY R, TAO R. Effects of parents' migration on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left behind in rural China[J]. Popul Dev Rev, 2014,40(2):273-292.
- [4] 代睿.卫计委调查:过半数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超半年[EB/OL]. [2017-11-10]. <http://www.thecover.cn/news/472311>.
- [5] 唐冬纯,蔡伟聪,李丽萍.广州留守与非留守儿童校园受欺凌情况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学校卫生,2018,39(7):1050-1053.
- [6] LIU Y, LI X, CHEN L, et al. Perceived positiv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s a protective factor for Chinese left-behind children's emotional and behavioural adjustment[J]. Int J Psychol, 2015, 50(5):354-362.
- [7] 陈京军,范兴华,程晓荣,等.留守儿童家庭功能与问题行为: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22(2):319-323.
- [8] BROIDY L M, DADAY J K, CRANDALL C S, et al. Exploring demographic, structural, and behavioral overlap among homicide offenders and victims[J]. Homic Stud, 2016,10(3):155-180.
- [9] SAMPSON R J, LAURITSEN J L. Deviant lifestyles, proximity to crime, and the offender-victim link in personal violence[J]. J Res Crim Delinq, 1990,27(2):110-139.
- [10] NOFZIGER S. Deviant lifestyles and violent victimization at school[J]. J Interpers Viol, 2009,24(9):1494-1517.
- [11] 刘俊升,赵燕.童年中期受欺负与问题行为之关系:一项两年纵向研究[J].心理科学,2013,36(3):632-637.
- [12] JENNINGS W G, HIGGINS G E, TEWKSBUURY R, et al. A longitudinal assessment of the victim-offender overlap[J]. J Interpers Viol, 2010,25(12):2147-2174.
- [13] JENSEN G F, BROWNFIELD D. Gender, lifestyles, and victimization: beyond routine activity[J]. Viol Vict, 1986(2):85-99.
- [14] HIRSCHI T. Causes of delinquency[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 [15] HIGGINS G E, KHEY D N, DAWSON-EDWARDS B C, et al. Examining the link between being a victim of bullying and delinquency trajectories among an African American sample[J]. Inter Criminal Justice Rev, 2012,22(2):110-122.
- [16] MOHEBBI M, MIRNASAB M, WIENER J. Parental and school bonding in Iranian adolescent perpetrators and victims of bullying[J]. Sch Psychol Inter, 2016,37(6):583-605.
- [17] BRUNSTEIN K A, KOPELMAN-RUBIN D, AL-YAGON M, et al. Victimization by bullying and attachment to parents and teachers among student who report learning disorders and/or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J]. Learn Disab Quart, 2016,39(3):182-190.
- [18] DEMARAY M K, MALECKI C K. Perceptions of the frequency and importance of social support by students classified as victims, bullies and bully/victims in an urban middle school[J]. Sch Psychol Rev, 2003,32(3):471-489.
- [19] BOLLMER J M, MILICH R, HARRIS M J, et al. A friend in need: the role of friendship quality as a protective factor i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bullying[J]. J Interpers Viol, 2005,20(6):701-712.

与抑郁的相关性,因此本研究将 ACE 评分作为分析指标,结果显示,ACEs 评分与抑郁之间存在关联,且对抑郁的风险有明显的累积效应,随着遭遇过 ACE 种类数的增多,青少年抑郁发生的风险有增加趋势,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11,16]。各种 ACEs 之间相互作用,又在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上共同影响抑郁的发生。

本研究表明,青春期早期青少年 ACEs 发生率极高,各种 ACEs 与抑郁之间存在关联,遭遇 ACEs 的数量对抑郁的风险有累积效应。提示不仅要重视各种 ACEs 的筛查和预防工作,优化青少年儿童期的生长环境,降低 ACEs 发生率,还应在社会、学校、家庭等对青少年开展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等工作中,尽早关注 ACEs 的遭遇者,为其提供针对性的心理和社会支持,提高青少年应对各种 ACEs 的能力,降低 ACEs 导致的抑郁等心理问题发生的风险,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志谢 该研究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进行总协调。感谢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世界卫生组织、大卫和露西尔帕卡德基金会、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以及橡树基金会的支持。

4 参考文献

- [1] 马金凤,戴江红,茹建国,等.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儿童期不良经历的关系探讨[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3,17(3):218-221.
- [2] 于增艳,赵阿勤,刘爱书.儿童期受虐经历与抑郁的元分析[J].心理学报,2017,49(1):40-49.
- [3] NANNI V, UHER R, DANESI A. Childhood maltreatment predicts unfavorable course of illness and treatment outcome in depression; a meta-analysis[J]. Am J Psychiatr, 2012, 169(2):141-151.
- [4] HUGHES K, LOWEY H, QUIGG Z, et 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adult mental well-being: results from an English national household survey[J]. BMC Public Health, 2016, 16:222.

(上接第 873 页)

- [20] 黄亮.我国 15 岁在校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情况及影响因素:基于 PISA2015 我国四省市数据的分析[J].教育科学研究,2017(11):36-42.
- [21] 雷雳,王燕,郭伯良,等.班级行为范式对个体行为与受欺负关系影响的多层分析[J].心理学报,2004,36(5):563-567.
- [22] PEGUERO A A. Opportunity, involvement, and student exposure to school violence[J]. Youth Viol Juven Justice, 2009,7(4):299-312.
- [23] BIBINUR Z, ELENA B. Model of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prevention of teenagers deviant behavior[J]. Eur Sci J, 2013(2):143-149.
- [24] 沈吟微,钟华.赫希的社会控制理论与中国城市青少年的越轨行为[J].净月学刊,2015(1):104-112.
- [25] 叶敬忠,王伊欢.留守儿童的监护现状与特点[J].人口学刊,2006,28(3):55-59.
- [26] 段成荣,吕利丹,郭静,等.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和发展基本状况: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学刊,2013,35(3):

- [5] FELITTI V J, ANDA R F, NORDENBERG D, et al. Relationship of childhood abuse and household dysfunction to many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death in adults. The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 Study[J]. Am J Prev Med, 1998, 14(4):245-258.
- [6] KABIRU C W, BEGUY D, CRICHTON J, et al. Self-reported drunkenness among adolescents in four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associations with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J]. Child Adoles Psychiatry Ment Health, 2010, 4:17.
- [7] RICHARDSON L P, MCCAULEY E, GROSSMAN D C, et al. Evaluation of the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Item for detecting major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J]. Pediatrics, 2010, 126(6):1117-1123.
- [8] 余春艳,左霞云,廉启国,等.上海市青春早期青少年指长比与性发育抑郁及攻击行为关联[J].中国学校卫生,2017,38(2):238-241.
- [9] 马双双,万宇辉,郝加虎.童年期不良经历与终身健康[J].卫生研究,2016,45(5):857-861.
- [10] 姚捷.医学生儿童期不良经历与其自杀行为的相关性分析[D].合肥:安徽医科大学,2006.
- [11] BROCKIE T N, DANA-SACCO G, WALLEN G R, et al. The relationship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to PTSD, depression, poly-drug use and suicide attempt in reservation-based native America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J]. Am J Comm Psychol, 2015, 55(3/4):411-421.
- [12] 孙洪涛,赵丹,袁同春,等.大学生童年期性虐待及其与不良心理关系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0,31(11):1296-1298.
- [13] 肖琴.安徽省医学生儿童期不良经历与相关风险行为的关联研究[D].合肥:安徽医科大学,2008.
- [14] CHEN X, WANG L, CAO R. Shyness-sensitivity and unsociability in rural Chinese children: relations with social, school,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J]. Child Dev, 2011, 82(5):1531-1543.
- [15] 马全瑞,刘广天,吕国良,等.童年期家庭不良经历与成人精神分裂症相关性病例对照研究[J].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18,19(4):246-249.
- [16] 杨苗苗.负性生活事件感受对中学生心理韧性与健康关系的中介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6,24(12):1889-1892.

收稿日期:2019-03-05;修回日期:2019-04-18

- 37-49.
- [27] 范先佐,郭清扬.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回顾与反思[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2(1):55-64.
- [28] 唐有财,符平.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基于亲子分离具体化的实证研究[J].人口学刊,2011,33(5):41-49.
- [29] HU H, LU S, HUANG C C. Th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outcomes of migrant and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J]. Child Youth Serv Rev, 2014, 46:1-10. doi:org/10.1016/j.child.youth.2014.07.021
- [30] HAN Y, KIM H, LEE D. Application of social control theory to examine parent, teacher, and close friend attachment and substance use initiation among Korean youth[J]. Sch Psychol Int, 2016, 37(4):340-358.
- [31] 李梦娜,史慧静,张喆,等.班级氛围对随迁子女校园欺负行为的影响[J].中国学校卫生,2015,36(2):194-197.

收稿日期:2019-03-08;修回日期:2019-04-12